

# 殷鉴与路标

# 鲁迅编辑思想研究

李金龙◎著

YINJIAN YU

LUBIAO

LUXUN BIANJI  
SIXIANG YANJIU[illegible][illegible]

中国戏剧出版社

非外借

广东省委宣传部“文化繁荣”专项资金资助

# 鲁迅编辑思想研究

YINJIAN YU  
LUBIAO  
LUXUN BIANJI  
SIXIANG YANJIU

中國戲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鉴与路标：鲁迅编辑思想研究 / 李金龙著. —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1

ISBN 978-7-104-04697-4

I. ①殷… II. ①李… III. ①鲁迅(1881-1936) —

编辑学—思想评论 IV. ①G2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9345号

## 殷鉴与路标：鲁迅编辑思想研究

策划编辑：张霞

责任编辑：王松林

责任印制：冯志强

出版发行：中国戏剧出版社

出版人：樊国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L座

邮编：100055

网址：www.theatrebook.cn

电话：010-63385980（总编室）

传真：010-63383910（发行部）

读者服务：010-63381560

邮购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天宁寺前街2号国家音乐产业基地L座

印刷：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1

字数：295千字

版次：2019年1月 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978-7-104-04697-4

定价：98.00元



# 序

孙 郁

王富仁先生曾经说过：“没有现代印刷术的发展，没有从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刊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也没有新文学四大文体形式的确立以及四大文体内部关系的新的调整。”这是一个共识，现代文学研究不能不关顾的就有传播学的话题。不过，由于目前学科的设立，学人们对于作家的看法有时是局限于自己的学科背景的，这自然影响了一些问题的判断。如今人们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其实是试图在出离这样的困局。在个体化的思考里体现整体性思维，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都是不能不做的工作。

有学者已经指出，我们在文学之外的视域里，方能够把握一些复杂的现象。比如现代艺术的诞生纠缠着许多因素，它与民族国家、中产阶级的出现以及新媒体的存在大有关系。不仅西方如此，东方亦带有此种特征。我们反观晚清以来中国知识群落的奋斗史，当感到此现象的耐人寻味。回望那时候的历史可以发现，传统经典的普及受到了新传媒的影响，新思想也诞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现代性之门的打开，靠的是多种学理与精神之力的推动。知识分子如何借用传媒从事启蒙与社会变革活动，其实有着文化史中诱人的内容。

早有人从五四那代人的精神实践里看到了此点。以鲁迅为例，他与报刊、出版社的关系，以及自己的编辑活动，牵扯着文化史的诸多神经。鲁迅给我们的难度是，不能够在单一的文学思维里观照其生命行迹，他一生从事的工作横跨数个领域，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就带出着诸多背景：教育环境、舆论空间、政治氛围、书写习惯……文学家与出版体系的互动关系，倒是能够看出时代的立体性的

一面。

李金龙所做的就是这样的研究。当看到他的书稿的时候，感受到深切的思考里的快慰。作者在大量史料的梳理里，昨日历史纷乱的一页被进行了有趣的注解。

现代传媒给知识界带来的最大的便利是，与时代的对话去掉了围墙。不仅藏在深宫里的作品也可以直接展示在读者面前，人们对于时局瞬间的感受也很快传递出来。受到域外文化的影响，近代知识人从书斋里走到媒体里，具有了直接和世界对话的可能性。梁启超、陈独秀、胡适所以与传统士大夫不同，就在于他们具有认识论的革命性，方法的革命性，传播的工具的革命性。这三者缺一不可，恰恰是借助工具的革命性，他们把现代性的精神光泽，辐射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我从李金龙的研究中发现，作者对于鲁迅的文化精神的流动渠道的认识颇为深入，不仅仅看到了精神的发、本色的一面，也对于其社会活动的方式特点做了详细的梳理和思考。鲁迅如何创造性地使用艺术工具推陈出新，被其——点染出来。

这是一个用单一认知模式难以解释的存在。思考鲁迅这样的人物需要历史的整体感和细节的真实还原。纵观鲁迅一生，留日时期的文学活动，其实除了译介域外的作品，还有编辑杂志的冲动。这自然与章太炎、梁启超的影响有关，但在根本层面，也存有寻找自我的选择。我们从周氏兄弟早期活动看他们的思想，当能够感受到新旧知识人的界限。而在五四前后的创作实践里，鲁迅与媒介的多种交织，也折射出其与同代人不同的个性。这个角度提供的景观，有思想的另一面。我们看彼时的知识界的分分合合，也会知道新文化内部的复杂性。而后来，当鲁迅与青年作家一起编辑出版左翼意味较浓的杂志时，其生命中迷人的一面也渐渐出来。相对于象牙塔里激进知识人的选择，鲁迅更知道拓展艺术平台的重要性。

在鲁迅看来，新的思想与艺术的出现，必须有属于自己的载体。知识人不都是审美的沉思，还应有在世间耕耘的辛苦。编辑对于鲁迅而言，像农民种地一样，用自己的血汗浇灌出喜爱的果实。但又不是迎合别人，而是引领大众寻找属

于自己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也是精神的设计者和思想的导演。我们如果从这个层面看他的选择，就会发现，他不是一个在纯粹理性中面对世界的人，而是在对话中建立自己的人生观的战士。从他积极介绍尼采、契诃夫、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高尔基的作品中，能够感受到他精神的渴求。而这些作品从翻译、编校、设计、出版，多以己身之力为之，那些艺术品的诞生，看得出编者的智性之高。这里留下了精神图谱里重要的线索，也为我们了解其思想的生成提供了参考数据。

在鲁迅编辑的图书、杂志里，有日本读物的影子，俄国与德国的理念也跃然纸上。但有时候也有中国明清印刷品的底色，传统士大夫的影子也是有的。他给自己的杂感集起书名，都有明清士大夫作品集的味道，书籍装帧带有古朴之气。在培育新的艺术产品里，保留最古老的东西，其实是鲁迅的梦想。他年轻的时候主张“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在后来的实践里都得以证实了。

鲁迅一生做了许多跨行当的工作，所以亲自参加编辑实践，是自己的使命感和价值态度所决定的。当《新青年》分裂后，他意识到寻找自己的平台的重要。一个不依附于他人的媒介，可以传播出自己最希望传播的声音。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就写道：“北京的印刷品现在虽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却少。《猛进》很勇，而论一时政象的文字太多。《现代评论》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却很显得灰色，《语丝》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大约因为看得中国的内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罢。”无法认同别人的时候，一切只能靠自己，否则就成了无所事事的旧式人物。而那时候能够给他快慰的大多是青年。他后来与青年们一起打造新的刊物和出版社，成了选择的重点。这种集创作、翻译、编辑、出版于一体的工作，能够看出鲁迅的能量的非凡。

李金龙在研究中尽量照顾到了鲁迅编辑生涯的方方面面。既看到了编辑意图中深处的隐含，也发现了出版策略。而对于商业运作与思想抵抗间的复杂联系，也做了有趣的说明。重要的是，文学社团与流派的活动空间在这里是以复杂性的方式出现的，从另一个侧面，我们看到了鲁迅的独立性与丰富性。

如果我们对比同代的许多出版物可以看到，鲁迅经营的杂志和图书，带有精神的前沿性和审美的先锋性。就眼光而言，他所译介的作品都非平庸之作，多为国人难见的有创造性的文字。而又能够启示知识人对于当下文化发声。重要的是，他在编辑过程，不忘的是“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使命，扶植了大量青年进入文学领域，那些鲜活的作品因为他的支持得以与读者见面。以出版而推出新人，这也是他深切的父爱精神的体现吧。

我们的作者在叙述里对于鲁迅的编辑思想做了多方面的梳理。许多篇章阐发出幽微中深广的情思，其中关怀意识，出版的期刊品质，内在导向，审美风格，衍生的话题殊多。沿着这些思路，也可发现了许多难点。比如鲁迅的编辑逻辑和传播悖论，比如独断性的选择可能导致的误读与误判，比如对抗性的思维可能带来的对于异己的群落的忽略等等。在面对这些难点的时候，就会发现，鲁迅的思想是在各种对抗和对话中诞生的。他不仅面对政治的压力，也有商业的压力。在泛意识形态与泛商业化的环境里，坚守知识分子的立场十分艰难。从出版业的角度看鲁迅那时候的选择，当感到战斗的不易。可以说，鲁迅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知识分子的道路。

在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里，鲁迅给出版界带来了万花筒般的景观，他在选题、风格和审美方面独步江湖，数量与质量都让人刮目相待。从文学领域看，他最早介绍了摩罗诗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达达主义作品；在美术界，敏锐地将表现主义、立体派艺术引入出版物中；理论方面，他翻译了普列汉诺夫与卢那察尔斯基的书籍；而创作方面，推出一批有活力的青年作品，萧军、萧红、叶紫、柔石等人都有其提携而被读者记住。从无到有，从陌生到熟悉，要填补的是一种精神的空白。在一个缺少人道与爱意的国度，知识分子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输进新鲜的思想，改造国民的精神。细看他在媒体界的出出进进，其表达的格式是有创造性的。拿来主义的因素颇多，而精神底色里，重要的是对于本土的创作的渴念。在鲁迅看来，思想不得畅达表达的时候，中国还不能算一个文化大国。而在引进外来艺术品的时候，也重新激发了其对于中国固有文明的认识，他后来把汉代造像的元素带进版画运动中，说明了他对另一种失去的国故的自信。

这是有趣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各种精神合力的作用。在摸索新路的时候，既有新风的吹拂，也有旧语的翻新，其工具性的存在也可以看出文化的连续性。即便是左翼文化建设时期，鲁迅对于前卫艺术的介绍和现实的沉思，除了有传统工具所没有的亮点外，汉唐气魄也暗含其间。研究鲁迅的这种实践和探索，不都是个体生命的审视，而是一个时代风气的凝视。在这个意义上，鲁迅与五四那代人，丰富了我们固有文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

在《关于知识阶级》一文里，鲁迅就认为，躲在象牙塔里是安全的，但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要做一些事情。鲁迅从事编辑活动的过程，看得出其精神之梦的闪动。这是许多京派的学人们做不了的工作，因为要付出，要自我牺牲。但在那时候做编辑，又要保持知识分子本色，要受到重重压迫。所以，在编辑的日子里，也是自己独战的日子。在介绍自己与《语丝》的关系时，鲁迅这样写道：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警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警告的由来，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几个人看作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待下一回说吧。

从一个人与一个刊物的关系，散出如此多的信息，便知道现代文学与现代艺术滋长的艰辛。而在有限的空间里，知识分子要拓展精神之路，就要横眉冷对旧的势力。所以，今天我们来回忆那段历史，当惊心于那时候的现实的残酷。不了解鲁迅的这段艰苦奋斗的历史，对于现代文化的本然的存在将是隔膜的。

和平时期的青年，不太易理解鲁迅那代人的苦心，研究那段历史，不能够忽略的恰是那逆俗的阔达的情怀。这在鲁迅的文字里随处可见。1934年1月，在



编辑了《引玉集》后，鲁迅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对于木刻的介绍，先有梅斐尔德（Carl Meffert）的《士敏土》之图；其次，是和西谛先生同编的《北平笺谱》；这是第三本，因为都是用白纸换来的，所以取“抛砖引玉”之意，谓之《引玉集》。但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见的只是狐狸的跋扈和雉兔的偷生，在文艺上，仅存的是冷淡和破坏。而且，丑角也在荒凉中趁势登场，对于木刻的介绍，已有富家赘婿和他的帮闲们的讥笑了。但历史的巨轮，是决不因帮闲们的不满而停运的；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文学艺术生产的过程，要克服盲点和政治禁忌，对抗风气和传统习惯，而且还具有精神灯火的作用。在讨论这些片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鲁迅提供的课题，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作家。从李金龙展示的脉络看，鲁迅一个人，就覆盖了现代精神的许多领域。他在翻译、编辑、出版策划与展览策划里，催促出难得的艺术之花。可以说，鲁迅是现代艺术舞台一位伟大的设计者，在艺术天地里涂抹出让人惊艳的思想光点。在这里，旧的表达失去力量，而现代人的价值与理想，被定格在时光的深处。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这一丰富的现象，我们的精神也因之得以提升了。

2018 年于北京

# 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之“结”的鲁迅

## ——李金龙《鲁迅的编辑思想》序

李 怡

鲁迅是谁？他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这在今天的中国不会再是一个什么问题了。今天的问题可能在于，我们也许在问，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始终“追随”着我们的成长，始终能够进入到现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进程当中，成为一个“绕不开去”的历史存在？最后，又是如此紧密地进入了我们的知识体系？

然而平心而论，其实并不是鲁迅本人在“追随”我们的人生，不是鲁迅一定“要”进入我们的知识系统，因为，他早在1927年9月就说过：“在广州的一个‘学者’说，‘鲁迅的话已经说完，《语丝》不必看了。’这是真的，我的话已经说完，去年说的，今年还适用，恐怕明年也还适用。但我诚恳地希望他不至于适用到十年二十年之后。倘这样，中国可就要完了，虽然我倒可以自慢。”<sup>①</sup>以鲁迅对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设想，还有他那深刻的“历史中间物”意识，他显然无意“占领”历史，甚至根本就不看好这样的“占领”的意义。然而，事与愿违，恰恰是作为历史后人的我们常常在主动地“拉拽”着他，“牵扯”着他，“鲁迅之后”的历史似乎很难离开鲁迅的身影而独自存在——无论在这一段历史中的人们是怎样具体地估价鲁迅的意义：将他送上历史英雄的峰巅，还是打入晦暗不明的深谷。

---

<sup>①</sup> 鲁迅：《而已集·“公理”之所在》，《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2页。

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奇观，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文化之“结”的意义表现在一系列的领域。

**中国思想的世纪性变迁。**众所周知，个人的社会价值与哲学价值的确立是中国思想世纪性变迁的重大课题，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启蒙思想产生与演化的主流。在这方面，我们很容易从鲁迅思想中发现启蒙的丰富内涵，发现他对于个人主体地位的呼唤与建构。例如鲁迅留日期间期的“立人”思想，“任个人而排众数”著名主张的倡导等等，在五四时期，鲁迅又阐发过“个人无治主义”与“人道主义”，鲁迅一生都致力于公民立场与反奴隶立场。但是，鲁迅又不仅仅是在启蒙哲学中思考问题。他更深刻地体悟到了近代以来的启蒙理想如何在生存着的现实所遭遇的尴尬。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以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sup>①</sup>显然，鲁迅理性主义的启蒙立场当中汇入了个体生命的立场。有学者言：“鲁迅在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中间，是唯一一个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注定是悲剧性的人。”<sup>②</sup>

今天，人们似乎更多地发现了鲁迅与一般启蒙主义的差异，并且开始从存在主义、现代生命哲学的角度解读鲁迅。黑暗、虚无是鲁迅思想的“关键词”的意义已经获得了相当的阐述。像这样的一些语言被反复征用着：“我的思想太黑暗，但究竟是否真确，又不得而知。”<sup>③</sup>“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sup>④</sup>“我只很明确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sup>⑤</sup>人们发现了鲁迅“反抗绝

① 《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418页。

② 王富仁、赵卓：《突破盲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③ 鲁迅：《两地书·二四》，《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④ 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⑤ 鲁迅：《坟·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

望”与加缪笔下的“荒诞英雄”的相似之处。但是，即使是这样，鲁迅依然属于他自己。在鲁迅那里，有荒诞体验却没有“局外人”的体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鲁迅对于自己的空间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一个‘被排斥在外的人’。”<sup>①</sup>鲁迅具有强烈的死亡意识，同样在反抗绝望中“确立自身”，但他并没有产生“不负责任”的快感。相反，他的反抗是他力所能及地承担改造生存这一责任的方式。“中国的历史注定要用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的悲剧筑起一道现代化的堤坝，把传统的愚昧和专制挡在‘过去’的历史上。”<sup>②</sup>“如果说西方的存在主义者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离开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鲁迅则高举着生命哲学的旗帜更坚定地站在中国启蒙主义的立场上。”<sup>③</sup>

**中国现代政治革命的理想与选择。**鲁迅留日时期就参与了“排满革命”的活动，在现代历史的关键时刻也都是积极支持被压迫者的革命活动。他参加了“左联”，成为这一革命作家联盟的领袖。然而，对于革命，他始终有自己的理解。鲁迅同情被压迫者，拥护革命的理想，但又常常对革命的前途不抱太多的幻想。“革命，革革命，革革命，革革……”竟然成了他描述中国历史的一种话语方式，<sup>④</sup>他还言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体验：“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对于革命者常常提及的未来“黄金世界”，他时有讥讽，甚至还对冯雪峰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为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sup>⑤</sup>在给朋友的通讯中，又预言革命成功以后自己在将会穿上红马甲扫大街，“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sup>⑥</sup>对于中国革命的艰难性与中国社会改造的艰难性，鲁迅有自己独立的判断。

① 王富仁、赵卓：《突破盲点》，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② 同上书，第47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

④ 鲁迅：《忽然想到·三》，《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⑤ 李霁野：《忆鲁迅先生》，《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2册，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115页。

⑥ 鲁迅：《书信·至曹聚仁340430》，《鲁迅全集》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7页。

中国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一方面，同五四新文学作家一样，鲁迅高举的是“人的文学”的旗帜，致力于文学的启蒙价值的发掘，改造国民性成为他文学的基本主题。这一文学意念也早在他留日时期就已经确立。“我以我血荐轩辕”“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幻灯片事件等等都是我们熟悉的例证。鲁迅显然努力赋予文学以现实承担使命，以至今天也有人攻击鲁迅的所谓“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然而，我们同样有必要看到鲁迅与但一般意义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区别。这就是说，他对“文学的限度”有自己的独立认识。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所阐述的疑问是：“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sup>①</sup>这就提醒我们，文学是否真的能够承担起那样的使命？它会不会恰恰产生相反的后果？显然，这同样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在鲁迅的一生中，他多次谈到文学的作用及自己的创造体会，常常使用着“无聊”这样的字眼。《革命时代的文学》里有一个著名的说法：“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一文中，却阐述了一个关于“醉虾”的发人深省的比喻：

我发见了我自己是一个……是什么呢？我一时定不出名目来。我曾经说过：中国历来是排着吃人的筵宴，有吃的，有被吃的。被吃的也曾吃人，正吃的也会被吃。但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先生，你是看我作品的，我现在发一个问题：看了之后，使你麻木，还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沉，还是使你活泼？倘所觉的是后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证实大半了。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

---

① 《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9页。

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sup>①</sup>

钱理群先生在他关于鲁迅的论述中重新提醒人们关注冯雪峰的一个回忆：据说鲁迅著名的“遗嘱”《死》共七条，第五条云：“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千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冯雪峰在回忆中告诉我们，原意没有“空头”二字。<sup>②</sup>

当然，鲁迅对文学现实作用的怀疑又并不意味着他对文学的放弃，更不是在自己的“逃避”与“无力”寻找理由，这就像现在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总是在谈论死亡，谈论人生命的局限性，其实这是一种“以死观生”的思维，在这个时候，人们恰恰是无比深刻地理解着生命的可贵，也格外珍惜着生命的意义。对于“文学限度”的谈论，同样可以更加明确一个知识分子的实际效能，从而坚定自己可以把握的方向。在这一方面，王得后先生针对钱理群先生的补充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解读鲁迅，不可以仅仅关注那些个别的字词，而应该尽可能地“返回”到鲁迅自身的丰富与复杂之中，从鲁迅全部的思想取向来认定某一具体判断的实际意义。<sup>③</sup>

中国现代伦理观念。从20世纪20—30年代英美留学的知识分子到今天某些海外汉学家以及大陆“新锐”学者，他们对鲁迅人格的指责多集中在所谓的“偏激”“偏狭”与“不宽容”等等。但问题是当人们如此轻率地从“态度”出发就窥破了一个人的“人格”，这里所包含的不确定性与不可靠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透过“行为方式”对一个人内在“人格”的把握其实是很难的，这比单纯由“文字”所组成的“精神”特质更加缥缈，至少，我们自己居高临下地用以判断别人的基础——我们的伦理观念与我们自己的“人格”其实就需要一种新的认

① 《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4页。

② 见冯雪峰：《回忆鲁迅》（《雪峰文集》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264页）、钱理群：《与鲁迅相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6页。

③ 王得后：《对于鲁迅的发现和解读——和钱理群学兄讨论》，《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9期。

定。在指责鲁迅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行为”之时，我们很难证明自己的选择已经超越了鲁迅（至少在视野上）。特别是在充满功利主义需要的今天，种种对他人的指责常常就可能与自我的表现联系在一起，例如“打倒”了鲁迅的“人格”就可以获得某种现实利益上的“便宜”，但这样一来，对“人格”的探讨也就失去了意义，所谓的新的伦理道德根本无从谈起。这个时候如果平心而论，我们还是会觉得鲁迅的伦理选择比许多的中国人都更加的稳定和更加的表里如一，当然不是说鲁迅没有伤害过别人，但显然，即便是在现代伦理的层面上，我们也很难将“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完全统一起来，“为我”与“为他”始终就是所有人类道德都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且当放弃“为我”也无法真正的“为他”的时候，鲁迅的选择就不能说没有他伦理的价值。他以自己最小伤害他人为代价赢得了更多朋友特别是无辜的弱小者的真诚的尊重。是的，鲁迅“骂人”，但成为他痛骂对象的往往是强权，是得势者，在这里，鲁迅的“骂人”也成了一种挑战“权威”和“权力”的反抗，所谓的“偏激”就是为了对抗由所谓的“客观”“公正”所掩饰着的畸形的社会体制。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个独裁专制的政权（及其“帮闲”）已经拥有了几乎所有的“话语权”，所谓的“客观”“公正”最终不过是他们用以巩固制度合法性的一种手段。鲁迅“偏激”，鲁迅“骂人”，但激发他如此“偏激”，如此“骂人”的恰恰是现存制度的根本的畸形，鲁迅实在不过是用自己的方式反拨着现实的荒谬，扩大着现实社会的“公正”。在现代中国，当主张“宽容”已经在事实上堕落为维护现实制度与既得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借口，这样的“宽容”所包含的也就是人生残酷的本质，而鲁迅不过是较早洞悉了这一本质的清醒者。在《华盖集忽然想到》中，鲁迅描述了中国社会这样的一种生存景象：

但是，在黄金世界还未到来之前，人们恐怕总不免同时含有这两种性质，只看发现时候的情形怎样，就显出勇敢和卑怯的大区别来。可惜中国人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这样下去，一定要完结的。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什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sup>①</sup>

为了不让中国就这么“完结”，“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以“不宽容”还击制度的“不宽容”，这不记忆上一种新的伦理的建构？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坛的这种复杂的纠缠关系。鲁迅与现代中国文坛有着最丰富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他作为左翼文坛的领袖地位而是他一以贯之的人生态度与思维方式。“直面人生”“正视鲜血”生存姿态决定了鲁迅与许多自得其乐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重大区别：他从来不会回避对于现实中国问题的关注和议论，从来不会割断自身精神发展与中国文艺种种繁复现象之间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可以说是对中国现代文艺事业最殷切关注的人，他广阔的文学视野与持续不断的现实拷问都使得他比许多的中国作家更密切地关联着中国现代文坛的风云变幻：

与左翼文坛——直接介入，扶持青年作家（柔石、东北作家），与一部分领导保持良好关系（冯雪峰、胡风）；与另一部分领导则处于紧张的关系中（如周扬、徐懋庸等）。

与右翼文坛——批判态度。

与自由派文人——既有过密切合作（五四时期），也有过公开的分歧（分歧其实正是鲁迅发觉和自我总结思想独立性的过程，也是标示其他文学追求特质的机会）。

就这样，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坛的复杂介入——正面的推进与逆向的反驳——直接穿透和连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个部位，成为组合现代中国文学的一个“关键”。即便是在一个扭曲的时代（如“文革”），虽然人们也利用鲁迅的言论“打击”政治异己，但一旦“文革”结束，当中国人恢复到正常的思维状态，一旦我们又重新需要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昌盛”之时，后来的人们依然可以循着鲁迅

<sup>①</sup> 《鲁迅全集》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思想复杂穿插所构成的逻辑之网，最大程度地恢复文学的完整格局。

相反，其他许多的现代大家，特别是自由派文学家，都不时以“自言自语”的生存姿态自我标榜，他们回避了更多的思想交锋，因此就无法成为一个历史“绕不开”的“结”，他们的文学活动不足以连接起历史更丰富的场景，无法构成对“他者”的强有力的连续的思想冲击，也就无力掀开历史更本质的内核。到了新时期，几乎所有的思想家、文学批评家都是从鲁迅研究中诞生的、起步的。李泽厚、刘再复、王富仁、钱理群、汪晖……因为，他们在清理鲁迅的文学态度的同时，也自觉不自觉地清理出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宏大格局，研究鲁迅，进而复原了中国文学的更壮观的景象，“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鲁迅拯救了中国文化。”<sup>①</sup>

当然，作为现代之“结”的鲁迅还继续在我们今天的探索中延伸，比如我没下载读到的李金龙先生的这本著作，他总结的是作为编辑家的鲁迅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著作的论述是丰富的，涉及鲁迅作为编辑家的许多方面。我想，这其中大部分的体验都来自金龙先生自己的人生体会和工作经历，他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生毕业，同时又长期从事期刊编辑工作，对于期刊编辑的种种，当有深切的感受，今天，他以自己的感受为基础，遥想鲁迅当年的编辑生涯，真的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与鲁迅相遇了。除了他论著本身的观点之外，我特别感动于这种人生体验的价值，是的，能够与我们的人生相应的学术思考才是动人的、值得一读的成果，而经历大半个世纪的风霜雨雪，我们还能够在自己的人生经验中感动于鲁迅的精神追求，这是鲁迅的跨时代价值，也是我们自我成长的需要。

那么，作为现代文化之“结”的鲁迅也就还将伴随我们行走于人生？

2018 年于成都江安

---

① 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74 页。